

刘宾雁报告文学选

刘小雁 编

关于不会说假话 的中国人的故事

华岳文艺出版社



刘宾雁报告文学选

001342129

刘小雁 编

关于不会说假话 的中国人的故事

华岳文艺出版社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342129

刘宾雁报告文学选

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

刘 小 雁 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51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80549—136—4/I·95

定价：3.70元

历史无情 历史有情

——为刘宾雁《关于不会

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代序

李 贵 仁

难忘的1987。那一年，我和宾雁只见过一面。乍暖还寒时节，我专程到北京去看他。在他那位于京郊的寓所，两颗同样沉重的心，却同样坚定地表达了对中国改革大业的乐观信念。就在那时，我向他提出要给他出一本书。他却为我考虑，硬是不愿让我犯难。其后，多次书信往来，通长途电话，反复谈及此事，他还是那个态度。到年底，中共十三大开过了，他才答应下来。但他极忙，加之美国方面请他讲学一年，必须立即准备，他就很难挤出时间搜集和整理文稿了。今年三月，他赴美前最后一次和我通电话时，告诉我说编书的事只好由他女儿小雁来搞，同时商定了由我代为作序。我自然是很兴奋的，但又未免惶恐。为人作序的事，我从未干过；为宾雁作序，我似乎更不能干。怕的是序文拙劣，会使所序之书蒙受损害。

五、六月间，小雁终于把她为父亲编好的书稿陆续寄到了西安。我读了好几夜（绝大部分应该说是重读），居然鼓起了勇气，下决心尽快写出自己承诺的序文。没什么谱，信笔写罢。关于宾雁和他的作品，我毕竟有许多话要讲呵！

且从这本书的书名讲起。《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本是宾雁一篇未曾发表的报告文学的篇名，是我特意挑到这里用作书名的。当我毫不迟疑地决定这一点时，我脑子里闪出了一股异常强烈的、经久不退的思绪：倘若我能为宾雁写传，那传名，我也同样会定这一个——

《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诚然，以如此简朴的词语概括宾雁，决不可能道出他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思想家、理论家、翻译家和共产主义战士的全部特性，倒很可能使他的形象所赋有的独特光彩湮没于众多人士的共性之中。但我深信，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会承认，以“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来指称宾雁，恰恰是最能反映其本质特点的。宾雁所建立的功绩，宾雁所获取的声誉，宾雁所引起的仇恨，宾雁所遭受的祸难，岂不是全都源于他是个“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吗？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事实，可谓朗若白昼，难道还会有人怀疑、还需要论证吗？

讲到这里，我又觉得事情未免令人伤心。“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无论是宾雁这样评价别人，还是我们这样评价宾雁，都包含着至为深沉的敬意。恐怕大家都明白，这是作为中国人所能享有的极高的赞誉了。然而，

“不会说假话”乃公认的最低标准的人格要求，对幼儿园的稚童来说都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怎么竟变成了难能可贵的极高的赞誉呢？

这的确是个令人伤心的问题。它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颠倒，一种可悲的颠倒。最低标准变成了最高标准。每个人都应具备的普通品质变成了只有极少数人具备的伟大美德。说白了，这似乎意味着中国人的绝大多数都是会说假话甚至爱说假话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其实都反对说假话，而且都不会说假话。但是，令人伤心的可悲的颠倒又确实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该作何解释？显然，问题需要从另一角度去看。自古以来，和绝大多数人相对立，总有一些人是注定了只能说假话也只会说假话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恶性膨胀的某些私欲，比如情欲、性欲、钱财欲、权势欲、征服欲、统治欲，等等，必然不择手段地损害他人，因而必然采用形形色色的方式大说假话：或巧言令色，或公开撒谎，或指鹿为马，或颠倒是非，或翻云覆雨，或两面三刀，乃至搞阴谋，弄权术，设陷阱，诈骗暗算，借刀杀人……而最高明也最狠毒的一手则是所谓“引蛇出洞”。这是一种既可憎又可怕的社会现象。人世间的罪恶，人世间的痛苦，人世间的灾难，人世间的毁灭，多半与此相系。诚然，说假话者情况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危害也各不相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足惧也不足道的。但是，某些说假话者身份、地位举足轻重，把谎言和权势结合起来，事情就非同小可了。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又在自己只

说假话的同时，强迫别人也只说假话。他们惧怕真话。他们要动用一切手段，打击、迫害乃至镇压敢说真话而不肯说假话的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民遭殃自不待言，整个社会也就难免要崩溃了，历史必然停止前进，甚至倒退。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泯灭良知，丢尽人格，变得喜欢假话、反对真话，只不过他们一时无法改变受假话统治的局面罢了。相反，惟其如此，绝大多数人倒会更憎恶假话、更珍视真话，因而，倘若出现了敢冒任何风险以至冒死说真话而不会说假话的人，这“不会说假话”在他们心目中就自然从普通品格升值为伟大美德，变成一种难能可贵的极高的赞誉了。当然，这是一种包含着很明确的特定含义的赞誉，它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人格标准和道德标准的范畴。在这里，突出地昭示于天下的，是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还有一种顶天立地、宁折不弯的刚烈之气和牺牲精神。

我似乎扯得太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讲宾雁罢。平心而论，宾雁远不是个完人。在他身上，甚至可以发现朋友们也未必能容忍的毛病。但他不仅受到朋友们的挚爱，而且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受到亿万不相识的广大民众的崇敬，其声望之高，足可使他接受无冕之王的桂冠。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他写了许多很出色的文学作品吗？不，那样看问题太不确切，也太肤浅。其实，宾雁的文学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十分可观，在质量上也参差不齐，颇有一些粗糙直露、章法不严的篇什，那是肯定要被诸多美学家诟病的。何况他所擅长的主要是带有浓烈的政论性的报

告文学；他写的小说为数既不算多，可读性又不强，很难为他增添光彩；至于诗歌、戏剧之类，他更是只能算作外行。因此，单以文学成就而论，把他称为“时有佳作的优秀作家”就足够了，这在当今中国，是至少可以并列几百人的，绝对谈不上由他独领风骚。可他偏偏在当今中国文坛高踞于群雄之上，即令少数备受推崇的重要作家也难以望其项背。其缘由，显然是既在文学之内又在文学之外，而特别是在文学之外的。质言之，宾雁决不是个纯粹的文学家；如前所述，他还是个新闻记者、思想家、理论家、翻译家、共产主义战士；但在主要方面，说他是个人以文学为武器的真理捍卫者，恐怕更为确切。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超于文学界和其他许多界的常人，最具有伟大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具有顶天立地、宁折不弯的刚烈之气和牺牲精神。当然，这也就注定了他是个非常鲜明的“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即便在某些堪称正直而且颇有胆量的文学家也不得不违心地讲一点假话时，他也仍以铮铮铁骨傲立于世，决不说一句假话，还硬要多管“闲事”，毫不留情地把他所发现的人间的一切假话和假面、假象之类统统撕得粉碎。他笃信，只有真、善、美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而要使社会不断进步，达到真、善、美的境域，就绝对不能容忍假话，绝对不能容忍假话掩盖下的各种丑恶、各类罪行。他竭诚致力于帮助人们真实地看待一切，既真实地看待一切光明面，又真实地看待一切阴暗面。更可贵的是，他还决不限于只把各种生活现象完全真实地揭示出来；他总是要把生活的每个层次

都掘到阳光之下，他能够有胆有识地解剖社会生活的哪怕最难下手的极隐秘部分，引导人们从不同角度深刻地、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他这样做，无疑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他发出的总是人民的心声。而在夜以继日地这样做时，他又总是处于忘我的境界。为此，他连保护自己也顾不得考虑。他甚至不懂得保护自己！当然，他很清楚自己是经常得罪人的，还动辄惹恼某些权贵。但他从来无所畏惧，依然奋不顾身地到处向人们讲真话，到处向人们揭露假话，到处向人们展示生活的本质。不言而喻，这就难免为他招来仇恨和打击。且不说别的地方，即以我所在的西安而论，就不止一次有那么一小点人物以咬牙切齿的劲头恶狠狠地咒骂“刘宾雁这个坏家伙”，真可谓把人世间的一切仇恨都凝聚在一起，全化作弹雨喷射到他的头上了。他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他的代价决没有白付。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是：他付出的代价越惨重，他赢回的声誉就越高。那么一小点人物的恶毒咒骂，永远只能淹没在亿万人的赞美声中。历史不是已经记下了这一切么？噢，历史，它是既无情，也有情的，它比任何人都公正……

对，历史既无情，也有情。宾雁其人其文及其命运，每每触使我这样想。真令人感慨万端！不过，我沉思的时候更多。

我沉思得很痛苦，但在痛苦的沉思中，我又感到振奋。

我固执地想，宾雁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的，宾雁

身上所渗透的悲剧色彩太浓。是怎样的悲剧色彩呢？悲怆的还是悲壮的？抑或是令人悲哀的？也可能是令人悲愤的。还可能兼而有之。我似乎说不清。但我能够断定，我们在宾雁身上所看到的决不是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悲剧主人公。他不是屈原、杜甫、曹雪芹；他更不是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马拉、丹东；以拜伦、雪莱、杰克·伦敦或者马雅可夫斯基相比，也不合适。这样说，既不是因为他低于上述伟人，我们不敢溢美；也不是因为他还活着，并未惨死或者倒下。根本的区别在于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背景。宾雁属于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胜利的改革时代不可避免会产生的悲剧性的英雄。他和这个时代本身是共命运的。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而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我还在继续沉思。但是关于宾雁，关于他的作品，我觉得无须再说什么。

历史肯定会说得更多。那将不只是悲剧性的，而且主要不是悲剧性的。因为，宾雁为之奋斗的中国的改革大业，无论要经历多少曲折，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功。与此同时，“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也自然要不断地增长，并逐渐地失去这一概念所不应具有的特殊含义。人们将不再把它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极高的赞誉。我坚信这一点。我也正是因此而感到振奋。

1988年7月5日竣于西安东郊

